

海南向“一边高楼大厦 一边破屋烂瓦”说不

本报记者 何伟



近年来,海南省的扶贫工作取得不小成绩。2011年到2015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由82.9万人减少到47.7万人,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也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可观的数据并不意味着下一步扶贫工作将很容易。这47.7万贫困人口是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海南省采取了积极行动



海南省积极引入企业为贫困群众提供工作岗位,通过劳动力转移帮助他们实现脱贫。本报记者 何伟摄

一边是鳞次栉比的高档酒店,另一边是破屋烂瓦的贫困村。数据显示,目前海南省仍然有47.7万农村贫困人口,5个国定贫困市县,300个贫困村。

建立扶贫“大数据”

4000多人次、844个调查组、两个月时间、4次进村入户调查,巨大的工作量最终换来海南省扶贫“大数据”:至2015年底,全省农村贫困人口11.6万户47.7万人;有2.4万户9.7万人确认为2015年脱贫人口;有1.1万户4.3万人因不符合贫困户标准被剔除;有1.54万户6.5万人被确认为新增贫困户。

在这个“大数据”中,除了有数字,每一个贫困户的致贫原因、帮扶途径,甚至是哪位干部“一对一”帮扶都一清二楚。

在海南省屯昌县扶贫办办公室,《贫困户登记表》挂在墙上醒目位置。这张表中,全县贫困户的家庭成员、致贫原因、生产生活能力、收入来源等情况准确详实,一目了然。

屯昌县扶贫办主任王健告诉记者,《贫困户登记表》是省里组织入户调查之后,县里再次组织“回头看”摸底调查的结果。21个调查小组,103人的调查队伍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对全县8个乡镇、113个村进行了入户调查,确定了贫困人口7340人,对进一步锁定贫困人口和制定今后两年的扶贫计划打下基础。

建档立卡、建设扶贫“大数据”费时费力,成本也较高,但海南省副省长何西庆认为,这项工作值得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户的贫困原因不同,我们只有找出症结所在,才能定点消灭贫困。”何西庆说。

“你家几口人?主要收入来源有哪些?孩子还在上学吗?”低矮的瓦房前,帮扶干部耐心询问乡亲们这几年的家庭境况,并认真地做着记录。这样的场景,在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建档立卡工作的“大屏幕”中频频回放。

在国家级贫困县——海南琼中,建档立卡的工作更为精准和细致。2015年,琼中把全县划分为22个片区,派出450多名干部,配合22个省调查组,

开展了“一访二问三听四看五查”的“12345”调查行动。同时,按照贫困对象识别程序,开展一申请、三计算、一评议、两公示、一公告的“13121”识别行动,由农户、村两委、驻村帮扶工作队、乡镇、县逐层签字,精准识别。目前,全县识别贫困人口26598人。

“如果不经过详细的入户调查,我们可能不会知道很多家庭因为孩子上学而致贫,通过教育资助,许多家庭迅速脱贫,效果很好。”王健告诉记者,这就是扶贫“大数据”带来的好处。

因地制宜产业扶持

产业扶贫,选好产业是关键。海南是个“插根扁担都能发芽”的地方,自然资源十分优越,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与市场的变化,传统优势产业逐渐失去优势。

海南省曾经为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免费种植了大面积的橡胶林,前两年,不少群众的确也赚了钱。但是,随着橡胶价格的下跌,有些靠橡胶生活的老百姓陷入了困境。

在不少市县,扶贫干部想尽办法帮助这些群众走出困境。屯昌县是个农业大县,这里的循环农业尤为出名。“我们帮助贫困户在橡胶林下养殖品牌产品——黑猪,让不少群众走出了困境。”王健说。

林书取是屯昌县坡心镇关朗村的困难户,家里总共有4口人。“现在的橡胶价格不好,主要收入就是种水稻,每年也就2000元钱的收入。”林书取告诉记者。

通过摸底,屯昌县扶贫办知道林书取以前做过养殖,经过和定点扶贫单位屯昌县发改委协调,他们为林书取发放了5箱蜜蜂和5头黑猪苗。

领到蜜蜂和黑猪苗的林书取现在特别忙碌,悉心照顾着蜜蜂和黑猪,由于黑猪价格高,林书取又善于养殖,他预计,今年全家的收入就能够达到3万多元。

“我们关朗村总共有96户贫困户,56户是需要巩固提高的,40户是急需脱贫的。我们村林地多,适合做林下养殖,扶贫办就为我们村里提供了不少种

苗。现在,村民们又找到了致富的门路,我们有信心在今年内实现40户脱贫目标。”关朗村村支书周经崇告诉记者。

定安粽子是定安县的品牌农产品。雷鸣镇甘埔村的水、米十分适宜粽子产业的发展,村民朱跃章和朱庭斌两兄弟原先在县城做粽子生意,为了帮助村里的乡亲致富,兄弟俩把加工厂建在了村里。“端午节期间,我们收到了30多万个粽子的订单,需要200个工人三班倒来加工,这些人全部是村里的村民,有很多都是贫困户,还有十几个是我们的常年工,每个月他们都能拿到3000元到4000元的工资。”朱庭斌告诉记者。

“发展粽子产业就是我们为甘埔村找到的脱贫产业之一。做粽子的废水可以为贫困户养猪提供饲料,村民们还可以种植粽叶,还可以为加工厂提供猪肉、花生油、鸭蛋等。仅这个平台就可以为许多贫困户提供致富机会,脱贫效果很好。”雷鸣镇委书记陈朝明说。

发展特色产业脱贫是海南省制定的脱贫十大措施之一。海南省提出,贫困地区要实现脱贫致富,归根到底要依靠经济发展和产业支撑。结合实际,海南省加大了农业结构调整,改变低效种养业,从技术、信息、流通等方面支持贫困户因地制宜发展热带特色农业和养殖业。目前,种植、养殖具有地域特色的品牌农产品、发展乡村旅游等已遍布海南岛。

“滚雪球”实现持续脱贫

“给每户几只猪苗、羊苗,今年卖了钱,脱贫了,但明年呢?经济状况还是不能得到根本改善。”海南省定安县扶贫办主任许雄说出了不少基层扶贫干部们的困扰。

如何不再发生“返贫”现象?海南省摸索出了“滚雪球”式扶贫路子。

什么是“滚雪球”发展?许雄带着记者来到了龙山镇桐树村。

过去,这里道路泥泞,车辆难行,房屋简陋,危房林立,民风落后,吸毒成风。如今,这里道路宽平,新房林

立,群众安居乐业,气象焕然一新,一派祥和。

长期以来,贫瘠的沙壤土地只能种水稻。桐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宁瞄准了养殖产业。2014年初,由村两委党员干部7人共同贷款70万元成立的定安天堂山黑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经过两年的发展,合作社养殖黑山羊的规模扩大到存栏700只,两年共出栏2600只羊,年产值600多万元。

“去年,我们赚了不少钱,但当时全村还有105户没有脱贫。我们党支部决定依托合作社,无条件帮扶贫困户。”陈宁说。

通过“支部+合作社+贫困户”的帮扶模式,2015年,桐树村就有34户贫困户脱贫。

吴天富一家是脱贫的34户之一。2014年,吴天富到合作社打工,半年之后,吴天富可以选择拿走12000元的工资,也可以选择5只羊苗放在合作社继续繁殖。吴天富选择了后者。在合作社的科学管理和饲养下,吴天富的羊成倍增长。

如今,吴天富的羊存栏量达到了60只,去年卖了30多只羊,每只黑羊的净利润都在1500元以上。“以前穷得没地方住,现在新房子都盖起来了。”吴天富告诉记者。

合作社实行退出进入制,“已经致富的村民,我们教会他养殖技术,在条件成熟时要退出,时间不超过3年,然后下一批贫困户进驻。”陈宁说,对于部分资金不足的农户,合作社采取“先帮扶”的方法先带动群众致富,再回收帮扶资金。

今年初,又有30户贫困户进入了合作社,他们大部分以打工换取羊苗,通过合作社的管理、养殖、培训,他们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均实现了可持续性增收。

据了解,今年海南省要完成18.8万贫困人口的脱贫任务。贫困人口不仅要人均收入标准达到2965元以上,“而且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任务很重。但是通过不断探索创新扶贫方式,我们有信心完成这个目标,更有信心在2018年实现全部市县脱贫。”何西庆说。

8月30日晚上9点,在横店影视城,一部手机发出的直播画面,有近10万人同时在线观看。作为“东方好莱坞”,在横店随时能看见明星大咖,但这次参加直播的,却是来自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的两位普通果农——陈普庆与李世忠。

过去30年,陈普庆与李世忠别说四川省,连雅安市都很少走出去。十几天前,他们收到“淘宝汇吃·新农人”团队与阿里巴巴企业社会公益部的邀请,作为“善品公社”新农人代表,参加淘宝汇吃“中秋避吃会”活动,通过淘宝直播向全国消费者推荐乡亲们种植的蒙顶山红心猕猴桃。

陈普庆与李世忠分别是建山乡两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过去3年,在“善品公社”深耕上游策略的引导下,他们带领农户依照“善品公社”制定的严苛标准种植猕猴桃。陈普庆坚持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我种了18年猕猴桃,我知道这些种植标准是能种出好果子的。以前没人这么做,是因为我们要到市场上跟人拼低价、拼谁的果子大,所以怎么省成本、省人工怎么来。”

从2014年开始,“善品公社”让陈普庆和李世忠带领的合作社尝到了甜头。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旗下的社会企业,“善品公社”与果农一起组建合作社,为果农提供专业的种植指导和农资补贴,并以高于市场价40%左右的价格收购产品。合作社农户只要一心一意种出高品质的农产品,因为“善品公社”会负责对接市场和消费者。

今年8月,合作社出产的蒙顶山红心猕猴桃先后两次送检,都通过了国际权威第三方安全认证机构Inter-tek的安全检测——232项农残与重金属未检出。陈普庆和李世忠对诚信和品质的坚守,打动了许多消费者,很快引起了各大电商平台的关注,“淘宝汇吃·新农人”团队首先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这是陈普庆和李世忠第一次接触网络直播。他俩向网友介绍了蒙顶山红心猕猴桃的种植、挑选、储存方式,以及合作社的变化。有网友留言说:“大叔辛苦了,看见你们,就相信你们能种出好果子。”

4个小时的直播,网友们点了70多万个“赞”,并用实际行动给两位大叔投下了消费选票。陈普庆难以置信,只是聊了一会儿天,居然就卖出了2吨猕猴桃。

“实际上,从他们把猕猴桃交给‘善品公社’开始,他们就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了,而是成了与互联网密不可分的新农人。”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军说,“未来,‘善品公社’将带领更多农户进入互联网,让他们以及他们生活的农村发生更大蜕变。”

片场

“3+1”扶贫模式见实效

近年来,江西省会昌县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探索“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的“3+1”产业扶贫模式,解决扶贫资金、群众脱贫等问题。目前,全县各金融机构共为13家龙头企业发放产业贷款1亿多元,1万多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通过这种模式增加了收入。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会昌县紫云山休闲观光农业合作社社员在为铁皮石斛清理杂草。合作社获得扶贫贷款300万元,弥补了铁皮石斛种植规模扩大的资金缺口。



周口镇大坑村贫困户张卫通(右)夫妇在合作社务工,每月不仅有2000多元的工资收入,年底还可以分红。



河石寨果蔬专业合作社社员在劳作。通过产业扶贫贷款,合作社对入社贫困户所种蔬菜实行保底价收购,解决了贫困户蔬菜销售的后顾之忧。

用法治保障扶贫工作目标实现

——访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杜吉明

本报记者 李万祥

近年来,黑龙江省坚持依法治贫,着力推动扶贫工作有序开展,取得阶段性成效。“坚持有法必依,增强了法治扶贫的自觉性、责任感;健全制度机制,推进了法治扶贫制度化、常态化;依法规范权力运行,推进了法治扶贫责任追究制度;发挥法律引导作用,坚持了依法制定脱贫攻坚举措。”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杜吉明说。

但与此同时,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例如法治扶贫的观念还没有形成普遍共识,有个别领导干部习惯拍脑袋决策,导致扶贫项目规划失误、实施不力、监督缺失。一些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法律政策宣传还不深入;有关扶贫工作的政策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依法保障兜底脱贫力度还需加强;贫困村法制环境相对滞后等。

“扶贫工作是一项民生工程,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需要在法治制度构建层面上实现观念、政治、经济三个子系统的双向耦合、双向协调和双向兼容。”杜吉明说。

“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提高依法扶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杜吉明说,法治扶贫不仅是缓解直至最终消除贫困的必然选择,更是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内在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应牢固树立法治理念,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在扶贫工作中建章建制、健全程序、规范行为,严格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法惩处,始终以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治方式贯穿扶贫开发的全过程。

“要加快扶贫立法,完善扶贫开发法律法规。”杜吉明说,要发挥法律法规在脱贫攻坚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切实将扶贫开发的基本方针、目标任务、开发决策、资金管理、相关责任、监测评价等纳入法制轨道,实现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新农保、医疗救助等政策的有效衔接。如通过法律规定解决农村群众因灾、因病、因学、因婚等返贫问题,从法律层面对实施主体进行强制性约束,依法防止出现扶贫资金多

头管理、扶贫资源整合难度大、随意切块分割扶贫资金、地方财政配套资金落实难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济困工作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建立扶贫绩效第三方评估机制,建立扶贫对象退出激励机制。

“要依法制定和严格执行扶贫政策,努力实现扶贫方式方法法治化。”杜吉明说,各级政府应在具体扶贫工作中完善依法决策机制和健全扶贫重大决策、重点项目、扶贫对象的合法性审查机制,要按照“省级统筹、市级协调、县级整合”的原则,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切块到县,将项目审批权全部下放到县,支持各县特别是贫困县把专项扶贫资金、相关涉农资金、社会帮扶资金捆绑集中使用。

“要依法实行保障兜底脱贫,加强社会保障服务体系建设。”杜吉明说,进一步完善与扶贫开发相衔接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五保供养和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包括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社会救助服务

窗口,统一受理和转办救助申请;针对因遭遇突发事件、意外伤害、重大疾病或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专项救助后基本生活仍有严重困难的贫困户纳入临时救助范围;对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建立动态的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数据库;引导贫困人口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的贫困群体,应由当地政府全部代缴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并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安排。

此外,还要推进依法治理,加强法律服务,切实维护贫困人口合法权益,要营造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严格执法的良好环境;要依法加强贫困地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搭建融资、贷款、交易等合法平台;要积极争取将农村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纳入政府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尤其要大力开展扶贫法律政策宣传,让扶贫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杜吉明说。